



《欢迎来龙餐馆》的反战表达

■文/黄斯禹

战争电影如何表达反战，并不是一个新的电影命题。与直接呈现战场杀戮、暴力创伤和政治冲突不同，文牧野在《欢迎来龙餐馆》中选择了一条更贴近他既往创作经验的路径，将宏大的现实问题重新压缩进普通人的生存经验，通过小人物在困境中的遭遇与选择完成价值表达。从《我不是药神》中的“活命”到《奇迹·笨小孩》中的“谋生”，文牧野始终关注普通人如何被卷入远大于自身的现实结构，并在利益、生存与伦理之间作出选择。《欢迎来龙餐馆》将这一视角延伸至战争，却没有从战争本身组织叙事，而是从做饭、吃饭、赚钱、回家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诉求进入战争。因而，《欢迎来龙餐馆》并不是从战争出发理解人的生活，而是从人的生活出发重新理解战争。当一顿热饭、一间餐馆、一种正常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战争的残酷真正获得具体而可感的意义。

《欢迎来龙餐馆》的主人公徐福最初进入战争的方式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生活性的，做饭、赚钱、还债，然后回家。甚至当战争已经到来，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如何继续经营餐馆、如何利用环境变化获得更多收益。徐福一度不仅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甚至在特殊环境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获利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从逐利走向救助的变化才具有更复杂的伦理意味。这种人物设置延续了文牧野一贯的小人物叙事，人物并非天然高尚，也不是被预设为英雄，而是在现实压力不断逼近之后，被迫重新确认自己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战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外部事件”逐渐侵入人物的日常生活。餐馆的经营规则被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被改变，吃饭的人变成士兵、难民和孤儿，原本只想置身事外的普通人也逐渐发现，没有谁能够真正站在战争之外。片中“你真的认为自己与这场战争无关吗”的追问，实际上揭示了影片最重要的叙事转折。一个普通人即便没有参与战争，也无法因为保持沉默和距离便真正置身于战争之外。徐福改变不了战争，也无左右交战各方，他能够完成的只是属于普通人的有限选择。正是这种“有限”，构成了影片反战表达的现实基础。文牧野没有让一个厨师承担终结战争的英雄使命，而是让观众看到，战争如何一步步挤压一个人的生活空间，使吃饭、谋生、回家这些最朴素的愿望变得难以实现。反战也因此不再只是对于暴力的抽象谴责，而成为对于正常生活遭到破坏的切身感受。

如果说普通人的生存视角确立了影片反战表达的叙事入口，

那么“餐馆”则构成了这种表达最重要的意义空间。《欢迎来龙餐馆》最具辨识度之处，在于把“烟火”放置于“战火”之中，让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火”彼此映照。厨房里的火意味着烹饪、劳动和生活的延续，战场上的火意味着毁灭、死亡和秩序的中断；一个生产食物，一个制造废墟；一个维系生命，一个终止生命。由此，影片建立起烟火与战火、生存与死亡、给予与掠夺、日常与非常之间持续对照的意义结构。正如文牧野谈及创作时所强调的，美食代表安慰与日常，而战争对美食和生活的摧毁，反而使战争的残酷更加触目惊心。这种对照并不只停留于观念层面，而被转化为具体的视听形式。尤其在“圣诞突袭”段落中，暖意融融的灶台、圣诞音乐、后厨翻炒的明火与突然出现的炮火、炸弹形成强烈的平行蒙太奇与声画对位，原本属于节庆和食物的温暖氛围顷刻被战争撕裂。

片中的三次重要宴席同样形成了清晰的价值递进，最初的婚宴对应没有战争侵扰时的日常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美军基地的圣诞大餐呈现被战争权力异化后的荒诞秩序；逃亡途中为孩子们制作的一锅烩饭，则重新回到最基本的生命需要，成为生存、安慰与希望的象征。因此，“好好吃饭”成为影片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反战表达。战争按照国家、族群和阵营划分人，吃饭却将不同身份重新还原为最基本的生命存在，饥饿的人需要食物，疲惫的人需要休息，漂泊的人希望回家。餐馆因此成为战争空间中的另一种秩序，不是占有、掠夺和摧毁，而是制作、分享和给予。那碗可以容纳不同食材、最终调和成味的烩饭，具有超越食物本身的象征意味，与影片所呈现的包容、联结和共生形成内在呼应。当战争使“好好吃饭”都成为奢望，和平便不再只是宏大的国际秩序，而具体表现为一个人能够按时做饭、坐下来吃饭和家人团聚，意味着今天的生活可以自然延续到明天。《欢迎来龙餐馆》的反战意识和共生形成内应。当战争使直接的碰撞，在一碗饭、一间厨房、一张餐桌所代表的生活秩序中，让观众重新理解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牧野电影中的普通人往往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但人物真正发生转变的时刻，又总是在“如何活”这一问题出现之后。《欢迎来龙餐馆》同样如此。徐福最初关注的是赚钱、还债、生存，但随着身边人的死亡、战争孤儿的出现以及儿童被极端主义利用，他逐渐无法继续把战争理解为与自己无关的外

部事件。尤其是影片对儿童的处理，使这种伦理转变获得了更加明确的价值指向，在战争和极端主义逻辑中，孩子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也可能被转化为复仇和暴力的工具；而在徐福和俊生眼中，孩子首先只是孩子，他们应该吃饭、学习技能、长大，并拥有选择未来生活的权利。于是，反战最终落实为对一个具体生命不被工具化的坚持。这也使影片的价值表达由个人善意进一步走向一种共同体想象。战争不断以身份区分人，日常生活却以共同的生命需要重新连接人。无论属于哪个国家、民族或阵营，人都需要食物、安全、家庭和尊严，都渴望免于恐惧地生活。餐馆中不同国别、不同立场的人因为食物发生联系，徐福与老扎、托尼、俊生以及战争孤儿之间建立的情感关系，也使一个原本只是谋生空间的中餐馆逐渐成为容纳不同生命的临时共同体。影片中徐福母亲隔着视频与餐馆中不同身份的人挥手问候的场面，便以极其日常的方式呈现了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连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欢迎来龙餐馆》的反战表达已经超越对战争本身的否定，隐含着一种基于共同生命经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同时赋予影片一种内敛的中国国家形象表达。《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借助军事力量或宏大行动直接塑造国家形象，而是把“中国”落实在一个普通厨师、一间中餐馆以及“好好吃饭”的生活伦理之中。徐福不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代言人，他只是一个会做饭、想挣钱、最终选择保护具体生命的普通中国人。也正因为如此，影片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不是力量的炫示，而是以食物维系生命、以劳动重建生活、以善意连接陌生人的和平形象。一个“厨子”能够撼动的世事极其有限，但他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能够让被战争裹挟的人重新拥有成为厨师、养活自己、建立家庭的可能。

《欢迎来龙餐馆》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再次说明战争残酷、和平珍贵，而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属于普通人的反战方式。文牧野从一间餐馆、一顿饭和一个厨师的选择出发，把宏大的战争重新转化为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生活经验。烟火与战火的对照最终指向两种不同的价值秩序，一种制造毁灭与分裂，一种努力维系生命与联系。当“好好吃饭”都成为需要守护的权利，反战便由战争叙事转化为生命叙事，并进一步抵达对共同命运与和平价值的思考。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空间、美食与儿童——《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表达与突破

■文/王璇

《欢迎来龙餐馆》作为一部成熟的商业片，在类型化表达、叙事内容上十分精妙。在更深维度上，影片通过空间叙事、中立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展现了导演文牧野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深度思考，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影片对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的表达在国产电影中无疑是领先的。

空间叙事下的人物成长

影片通过三个叙事空间——龙餐馆、美军监狱、童兵学校承载了人物成长。在龙餐馆中，徐福作为绝对的空间主宰，他的人生目标只是赚钱还债。战争发生后，龙餐馆成为暂时的中立区，徐福主动将龙餐馆建构成自外于战争的空间。在龙餐馆之外，美军士兵和本地居民是绝对的对立面。而在龙餐馆中，美军士兵托尼暂时放松了对战争孤儿的警惕，即使在他心中“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当他走进龙餐馆，就必须遵从徐福的规则。

当来到美军监狱，徐福在空间中的权力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对空间的掌控权，他的目标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赚钱变成回家。但离开龙餐馆后的徐福，没有奥德修斯般的伟力，甚至连随波逐流的权力都没有，因此他除了观察美军对囚犯的权力压迫并寻找机会自保外，别无他法。

而当徐福来到童兵学校，其目标又发生了变化，空间的权力结构也彻底改变。如果说在美军监狱中，徐福在厨房中尚且保有自主权，那么在童兵学校，徐福彻底失去了这种权力——他不仅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甚至失去了对徒弟身体（选择）的控制权。空间转移与权力结构的变化，让徐福最终从一个存在瑕疵的主角成长为守护儿童的父亲。

马俊生的人物成长与徐福一样伴随空间转变而完成：他的目标在龙餐馆时是“当老板”，在美军监狱是“要回家”，而在童兵学校中则是“救孩子”。但追溯叙事逻辑，徐、马的底层目标一直没变：徐福的行为逻辑源自回家/归乡，而马俊生的行为逻辑则围绕“保护儿童”展开。随着空间的转变，这一底层逻辑才逐渐外化。当来到童兵学校，马俊生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目睹儿童赴死后情绪逐渐崩溃，于是他主动选择“救更多孩子”。虽没有完成，但他又激发了徐福的目标转变——“完成马俊生的遗愿”。至此，故事从龙餐馆这一空间的喜，到美军监狱的悲，再到童兵学校到达悲剧顶点，人物成长配合空间转变、权力结构的转移而完成。

中立视角下战争对人的异化

《欢迎来龙餐馆》选择讲述一场由美国发起的不义战争，可贵的是，影片通过对不同阵营的展现，突破了以往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站队”思维，以中立的视角展现战争中每一方的转变与异化。

在美军层面，每个人对战争都有不同的认识。“猫奴”托尼被送往中东做战争保障，最终死于汽车炸弹。托尼的悲剧性在于他相信国家宏观叙事的战争逻辑，坚信“我方”的正义，不明白所谓的“恐怖分子”本由美国制造。即使只是“后勤”保障，战争依然对他造成了心灵创伤。而笔墨更少的艾瑞克、皮特、摩根等军官，或大发战争横财，或滥用权力极尽官僚能事，又或享受战争，均在战争中横死。不再脸谱化的美军形象呈现了战争制造者的复杂面向，可谓国产电影叙事的一大突破。

在本地平民层面，每一位被战争异化的人都能让观众理解共情，这使得影片对战争人性的探讨更具深度——战争对人的摧残不是简单的身体创伤，而是使人彻底疯狂，乃至“合理化”疯狂。扎伊德本是当地权贵，却为美国军官所害导致家破人亡，最终成为极端军閥的帮凶。他选择报复的手段是炸死包括艾瑞克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而这种“恶”与美军所实施的滥杀毫无差别。对比影片前半段他对徐福、马俊生的包容，扎伊德的彻底“黑化”撕碎了他故事前

半段的柔情形象，更凸显了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可能被战争异化的逻辑。

在极端军閥层面，对阿里来说，战争是他的保护伞。在失序的战乱环境中，包裹着爱国主义的“反抗侵略”成为幌子，儿童成为实现权力的工具，人性至恶在极端军閥身上得以体现。而为阿里所用的儿童，即使活下来，或许也将成为下一个阿里。

文牧野对战争中各方势力的表现存在丰富的面向，人性的善恶在战争中存在极致的转换。至此，影片对战争的表达更具突破意义：站在普遍人性的角度反对一切不义战争，通过揭露侵略者的本质和造成的伤害，让观众自己思考：战争带来了什么？战乱中的善与恶又是什么？这种“不站队”式的客观表达，不仅重新定义了这场不义战争，更是对每一位观众的尊重：在反战逻辑下，展演战争对人所有可能的异化，将最终结论的主导权交到观众手中，由观众来完成最后一步思考——战争中只有输家。

美食元素包裹中国智慧

中立的“第三方”视角赋予影片更大的空间去填充中国人特有的思考和智慧。一是“好好吃饭”化解战争难题。导演文牧野在影片美食特辑中提到，“没有什么比好好吃饭更重要”。这点出了影片最核心的主题转化：由表象的“好好吃饭”传达了中国人面对战争的态度与对和平的期望。“好好吃饭”首先是中国价值观的传达。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吃饭是重要的仪式，它需要一家人坐下来，细数一天的辛劳；当孩子即将远行、远方的游子归家，父母会为孩子烹饪一桌美食。“好好吃饭”蕴含的东方智慧，正在于“民以食为天”的历史传统和“吃好喝好”的朴素愿望，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在这层含义的包裹下，战争制造者对地区资源的掠夺、侵略，其意义轰然倒塌。不义战争击碎的正是万千儿童“好好吃饭”的日常生活，在战争中，能坐下来“好好吃饭”是奢侈的愿望。而战争最后，普通士兵向往的也不过是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其次，“好好吃饭”的逻辑化解了战争逻辑，是中国人作为战争“第三方”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在托尼看来，赛夫天然是敌人，而徐福通过“你能不能好好吃个饭”化解了这套战争逻辑。徐福的“我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厨师”，传达了中国人的智慧——平淡是福。“好好吃饭”也是徐福消解战争残酷、反抗战争的智慧，看似立场激烈对立的双方，在徐福的龙餐馆中得以暂时放松，中餐成为跨越文化隔阂与立场的桥梁，也是中国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二是中华美食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影片中的“中华美食”不只是载体，更承担了叙事功能和价值表达作用。烩饭作为贯穿始终的载体，与人物成长产生互文。烩饭首次出现是在战争爆发前夜，彼时徐福认为烩饭是“边角料，上不了台面”，拒绝把烩饭加到菜单里。第二次出现是徐福被摩根打晕后，赛夫掌厨把烩饭做成汤泡饭，被徐福痛骂“烩饭就不用好做好了？”这句台词再次强调徐福对烩饭的不重视，也显示两人关系的改变——赛夫开始将徐福当成“半个父亲”。

第三次出现，是徐福和赛夫一同为劫后余生的孤儿做了一锅烩饭。烩饭在中国人的菜单里，的确“上不了台面”，因其通常只是主食，而不是一道“菜式”。但此时赛夫与徐福像真正的父子一样共同完成了这道烩饭，这道烩饭又成为慰藉孤儿们最好的一餐。最后一次是老年徐福回到龙餐馆，菜单上的“徐福烩饭”赫然在目。当初不能放在菜单里的烩饭成为“回旋镖”，在20年后正中眉心：这道烩饭最初毫不起眼，但当徐福踏入熟悉又陌生的龙餐馆，烩饭成了他和赛夫相认的终极密码。故事利用美食形成的工整对比比比皆是。同时，菜式也随着空间转换而变化。在龙餐馆中是中餐龙抬头、宫保鸡丁，在美军监狱中是融合菜左宗鸡、李鸿章杂碎，在童兵学校中是土豆炖牛肉。菜式的变化配合空间转

换，更是人物境遇、权力结构的变化：在龙餐馆中徐福无需迎合战争的任何一方；在美军监狱时期他只能低头做调和菜；而在童兵学校，做饭成了最重要的事，镜头开始对准儿童和逐渐崩溃的马俊生。这些铺垫正是告诉观众，徐福像“上不了台面”的烩饭，是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平民，但正是这样的“边角料”给出了战争的另一答案：好好吃饭，力所能及地救人。

“救救孩子”背后的中式价值观

在美食之外，影片选择儿童作为表达反战逻辑的又一元素。如何表达战争对孩子的摧残？如何拯救儿童？影片没有落入英雄主义叙事逻辑，而是通过“做力所能及的事”来传达一个中国平民的价值观。中国人不再是“救世主”，不再主动尝试解决能力之外的问题。对徐福来说，在战争中尚且无法自保，那么保护别人也无从谈起。在这一维度上，徐福这一人物更具真实性，他的人生目标只是“回家”，救更多的孩子并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

在此之前，他已被迫面对过很多死亡或失联，苏苏还活着吗？丽娜还活着吗？玛雅会死吗？即使没有交代她们的结局，但观众心中已有答案。正是这个沉重的答案令人感到压抑：可爱的苏苏会被战火吞没，战乱中的孩童会为一顿饱饭来到阿里的“学校”，不想当“炮灰”的贾马尔还是成了“炮灰”。最终，马俊生的死让徐福彻底崩溃，他明白了“那不是你的孩子，那也是孩子”的含义。即使决定拯救孩子，徐福也没有圣母般拖走玛雅，只救了“想走”的孩子。这种克制的表达在国产影片中极其难得，以文牧野为代表的新一代导演，超越了国别，更超越了“东方救世主”的窠白，中国人不再是“天降神兵”，而是试图站在普遍人性的角度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对无辜孩童的爱和底线。

由此，影片对儿童教育的表达也显示出一种中国式的反战逻辑。战争孤儿是“天生的恐怖分子”，这显然是美国的战争逻辑。美国士兵用这套话语体系为自己的滥杀找借口，但这一逻辑在徐福这里完全不成立。赛夫是战争孤儿，也是一张白纸。极端军閥要把他训练成“战士”，美军认为他是“天生的恐怖分子”，而徐福却认为“他未来会是很好的厨师”。在战乱中，孩子的恨意被人利用、贴标签，他们失去了定义自己的权力。徐、马一直教育赛夫“做厨子”“不要杀人”，其背后的逻辑恰恰是中国教育观的体现——“孩子被教育成什么，他就是什么”。在这一层面上，贾马尔是没有遇到徐福的赛夫，他本可能活到和平年代，但他的恨被阿里利用，成了童兵学校的第一个“炮灰”。

与贾马尔不同的是，赛夫的恨被徐福的“死”彻底化解，他的结局印证了徐福教育观的正确性。当看到那个做饭的背影，徐福笑的不只是赛夫还活着，更是笑徒弟成了“很好的厨师”。当结局揭晓，没有回头的背影成为绝妙的留白，观众哭的也不只是“师徒重逢”，更是赛夫没有成为下一个阿里，是他终于掌握了定义自己的权力。

对比美国媒体、文艺作品在相关战争中的颠倒是非，《欢迎来龙餐馆》在中立视角下对不义战争虚伪性的诉说，让影片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上达到了更高的叙事高度：当一部中国电影去重新审视一场由美国发动的不义战争，去“讲真话”，这对中国电影叙事进步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宣示着中国讲述世界故事的话语体系开始改变。

正如丽娜所说，“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龙餐馆即是中国的某种隐喻，几千年来“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的传统智慧在龙餐馆中得以印证，这也是影片要表达的中国方案。中国像徐福所构建的龙餐馆一样，用和平与美食化解仇恨，用兼容并包的思想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一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就不只是讲“中国”的故事，更是讲“中国价值”的故事。